

回忆秋白

杨之华

封面题字：胡愈之
封面设计：倪天煦

回 忆 秋 白
HUIYI QIUB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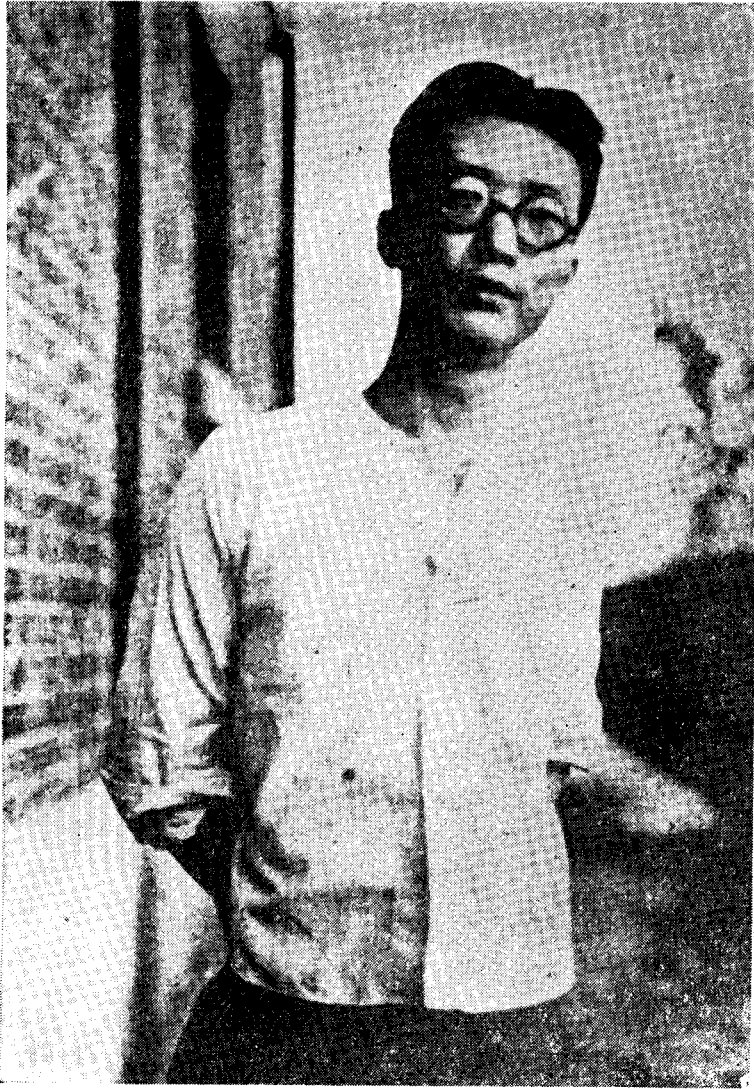
杨 之 华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5.5印张 124,000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400

书号 3001·1969 定价 0.76 元



瞿秋白，1927年在汉口中共中央办公机关。



瞿秋白和杨之华，1930年7月在莫斯科。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前在长汀中山公园中山亭。

目 录

一、熔炉·····	1
二、探索·····	15
三、春燕·····	29
四、热血·····	36
五、死对头·····	46
六、风暴·····	55
七、试金石·····	67
八、关头·····	75
九、考验·····	85
十、文化战士·····	97
十一、革命友谊·····	123
十二、“老家”·····	146
十三、不屈·····	160
后记·····	170

一、熔 炉

我和秋白是在上海大学认识的。那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

我原是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当时想做一个教员，对社会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使我睁开了眼睛，第一次接触了政治，从国内外反动派压制和诬蔑学生爱国运动的事实中认识了敌人的面目；同时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上海进步刊物——《星期评论》的影响，我的思想起了变化，再也不愿死读书、读死书了。那时听说《星期评论》社要组织一批青年去苏联学习，我就满怀热望到了上海，但结果没去成，就留在该社工作。一九二一年春，该社被封闭后，我回到萧山家乡，与浙江第一师范的进步青年宣中华等办农村小学，做农民工作。一九二一年底，农民李成虎组织了减租的斗争，但没有成功，李成虎被捕后死于狱中。在这次斗争中，一批教师受到了教育，我和宣中华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我的思想有了进步，就一心想摆脱家庭的束缚，参加革命。后来，听说上海有一所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这个消息象一线曙光，给我带来了希望，我决定去投考上海大学，于是又到了上海。

一九二三年寒假中的一天，我愉快地走进了闸北青云路庆云里。来投考的男女青年，已经把这座破旧的里弄房子挤得满满的了。我挤进人丛，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来。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

和蔼可亲的姑娘，后来知道她就是张琴秋同志。从大家兴奋的谈话中，我知道投考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当时抱着各种不同的志愿，但是后来很多人都成为我们亲密的同志和战友。

上海大学是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下，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创办的。校长是于右任，实际负责人是邓中夏和秋白，秋白任教务长。学校分三个系：社会学系主任由秋白兼任；中文学系主任是无党派民主人士陈望道；英文学系主任是国民党右派分子何世桢；三个系主任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而学生们的思想和成份就更复杂了，有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有国民党员（左、中、右三派都有），有国家主义派，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不问政治的人。这个学校简直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很尖锐。校内共产党和拥护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增长。上海大学就成为我们党的一个革命据点，成为一座锻炼革命青年的熔炉。

我在社会学系学习。这个系的学生占全校学生的半数以上，起初有五十多人，后来增加到四百多人。他们大部分家境贫寒，政治上倾向革命。

我很喜欢这个新环境，特别是那些可敬的良师和亲密的同志。他们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邓中夏同志是学校的总务长，经常在办公室里认真地工作着。他的头发很黑，眉毛又浓又长，眉心很宽，当他抬头看人的时候，两眼炯炯有光。他和同学们很亲近，常常给我们讲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共产党人的革命故事。名义上，学校的校长是于右任，代理校长是邵力子，但在实际上，一切校务都由中夏同志具体掌管。张太雷同志愉快活泼，教我们的政治课。蔡和森同志严肃庄重，讲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恽代英同志和萧楚女同志是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分

析问题一针见血，讲起话来诙谐幽默，常常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这些教师的年纪和同学们差不多，甚至比有的学生还年轻些，但他们讲课时知识渊博，在政治斗争中机智勇敢，所以他们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成为同学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我和秋白的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间。那时，秋白讲授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老同学们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讲课。老同学向我形容秋白讲课时的情景说：“在青云路上海大学旧校址上课时，人都挤满了。房子陈旧，人多了，楼房振动，似乎要倒塌下来，但是人们还是静静地听，一直到下课为止。”

当我听秋白讲课时，学校因学生增加，原校舍不够用，就从闸北搬到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敦厚里。秋白讲课的地方是一个最大的课堂，但我一到那里，就觉得这个课堂太狭小了，窗外和门口都站满了热情的听众，其中除了社会学系的同学，还有中文学系、英文学系的学生，有时上海其他大学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也来听课。课堂里的气氛很活跃，同学们亲切地谈着话，愉快地笑着，直到秋白从人丛中挤进来，安详地走上讲台，大家才肃静下来。那天，他进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跟他的脸庞很相称。他站在讲台上，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取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从容，讲话的声音不高，但站在课堂外边的同学也能够听到。

秋白讲课的习惯，是在上课之前，先把讲义发给我们，让我们预习，到讲课时，不是照着讲义念，而是在讲义的基础上补充了很多活材料。由于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为了使大家都能听得懂，他引用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当前的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当时在上海大学也有国家主义派分子的活动，他们欺骗了一些青年。不少进步同学虽然知道国家主义是反动的，但说不出所以然来，对那些受骗的同学进行教育时就缺乏说服力。因此，同学们向秋白提出了很多问题，要求解答。秋白就在讲课时，或者在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上，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言行，详细地剖析了国家主义的反动性和虚伪性，阐明了国家的起源及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实质，列举事实揭露那些国家主义的“醒狮”派（他们出版的刊物名为《醒狮》）头头，只是一小撮受国内外反动派豢养的狮子狗，他们狂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是企图以此蛊惑人心，利用青年单纯的爱国热情，而玩弄“外抗苏联，内除共党”的勾当。

同学们听了秋白的分析批判，认清了国家主义派的丑恶面目。不少受他们欺骗的人逐渐觉醒了过来，许多进步同学则有了与国家主义派作斗争的思想武器。

由于秋白的讲课能够帮助同学提高阶级觉悟和理论水平，解决思想问题和各种疑问，所以同学们喜欢听，认真地记笔记，有的同学因为参加社会工作而缺了课，总要借别人的笔记补抄。

秋白最初给我的印象是沉静、严肃，平时很少讲话，似乎不大容易接近。但不久，通过一次工作上的接触，使我改变了这种印象。

在上海大学，我和其他进步同学一样，在紧张学习的同时，还担负了很多社会工作。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我被分配到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工作，机关设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在那里，我认识了向警予同志，经常和她在一起工作。有一天，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大学支部转告我上级的通知，说孙中山先生的苏

联顾问鲍罗廷和他的夫人要了解一些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因为向警予同志有事离开了上海，就指定我去谈谈。我生怕自己讲不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鲍罗廷家里去了。

在鲍罗廷家中，出乎意外地，我看到了秋白，原来他是专为我们做翻译来的。一见到他，我觉得有了依靠，心情就平静下来了。秋白用俄语同鲍罗廷夫妇交谈着，把他们提出的问题翻译给我听，并且指点我说：“你先把这些问题记下来，想一想再慢慢说。”由于受秋白的鼓励，而且要我谈的情况我也比较熟悉，当时谈话的气氛又十分亲切友好，我的拘束就逐渐消失了，愈说愈起劲。秋白满意地微笑着，仔细听我说话，然后翻译给鲍罗廷夫妇听。最后，秋白又把鲍罗廷夫人介绍的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翻译给我听，唯恐我理解不了，还给我详细地解释，使我初步了解到苏联妇女的幸福生活，得到了很多启发和鼓励。

那时候，懂俄文的人不多，秋白还给其他一些同志当翻译。而秋白当时的工作是很忙的，除了在上海大学教课以外，主要是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具体负责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前锋》和参加《向导》的编辑工作，经常为这些党刊写文章。因此，他给同志们当翻译这项工作，同他担任的其他工作比较起来，似乎是一件“小事”。但秋白从来不轻视这个工作，每次都是很认真、很热情地去做，就同这次给我当翻译那样。

秋白为什么不管大事“小事”，都这样热情认真地去做呢？他在当时写给一个上海大学的学生的信中说：“我现在时时觉着为自己做事总不如为大家做事的好过。十九世纪的俄国青年往往说要‘为平民服务’，我现在觉得——真正的良心的觉得，不仅是理论上的推想，这是真正的‘生命’。”

通过工作中的接触，我感到秋白很真诚，很愿意帮助别人，对

待同志谦虚而热情。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同他一起工作时，才能感到这种深沉的热情。但秋白也有热情奔放的时候。记得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那天，在上海大学的纪念会上，秋白热情洋溢地作了介绍马克思的报告。报告结束后，他同任弼时同志一起纵声高唱《国际歌》，那种气势磅礴的革命激情，深深地感动了台下的同学们。

在学校里，秋白是一位有威信的教师，也是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追求进步的同学们，都愿意和他接近，把自己的希望、苦闷、困难和问题告诉他，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他也经常主动地找同学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工作以至生活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当时社会学系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组织和发动工人、学生、妇女、青年进行斗争的群众工作，碰到什么运动，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着，很少能顾到书本。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学认为工作这样紧张，应该把学习放下来；而另一些同学和个别教师则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不应该参加社会工作而荒废学业。这样，就对学习和社会工作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论。在一次讨论会上，秋白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革命学校的教学方针和革命青年对待学习的态度，都应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说，书是要读的，但不能死读书，因为书不是为了代替你思想而写的，而是帮助你思想而写的，学习革命理论是为了指导革命的实践；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实际工作，有助于领会革命理论、改造思想和取得实际经验。

经过这次讨论，大家提高了认识，能够正确地对待学习和工作了。我们注意钻研书本上的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就去请教秋白和别的革命教师。他们总是很乐意地帮助我们，有时还指导我们看有关的书。这样，大家的进步就比较快。

当时学生之间彼此有一些偏见：社会学系的看不起文学系、特

别是英文学系的同学，说他们是贵族、少爷、书呆子；而后者则反唇相讥，说前者是“挂名学生”“空头革命家”。秋白和别的同志发现问题后又对我们进行了教育。秋白对社会学系的同学说：你们应该首先打破成见，不要自以为进步而看不起人家，而应该主动去团结人家。革命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应该带动广大群众去干。文学系也有要求进步的同学，你们应该积极帮助他们，培养发展党团员。秋白还教育我们不要轻视文学，指出文学有无产阶级的文学，有资产阶级的文学，无产阶级的文学对革命是有推动作用的，要我们去听听文学课。秋白又对文学系的同学说：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学文学的人应该有革命的立场，不能脱离政治。经过秋白和别的革命教师的教育，各系同学之间的门户之见逐步消除了，彼此在一起进行座谈或联欢，文学系的同学参加社会工作的也多起来了，在他们中间也发展了不少党团员。

我在上海大学这座革命熔炉中，在党组织和秋白、向警予等同志的亲切教导下，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后，日益迫切地要求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向学校党支部和向警予同志提出了入党要求。不久，秋白对我说：“你要求入党的申请书，支部和我都看过了。因为我最近很忙，组织上要向警予同志与你面谈，但我也想找时间同你谈谈。”

我听了他的话，又高兴、又担心地说：“我对马列主义的理论不大懂，你讲的课我有时候还听不懂，实际工作的经验也很少，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党员的条件。”

秋白诚恳地说：“你是C. Y.，已经是靠近党的积极分子，只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把学习理论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更快地进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才能领会，你读书听课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问我和其

他同志。向警予同志很关心你，她跟我谈过你的情况。”最后，秋白约我在一个星期日到向警予同志家里去，谈我的入党问题。

向警予同志是一位很有学问、很有能力的革命活动家，是一个立场坚定、埋头苦干、以身作则的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她的口才很好，在训练班性质的妇女积极分子会议上，她所做的形势报告和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演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文章也写得很好，我们都很爱读。警予同志不是上海大学的教师，也不是学生，她当时担任党中央妇女部书记，但她经常到上海大学女生宿舍里来同我们谈心，谈形势，谈学习，谈思想，谈工作。她很关心我，从各方面帮助我。我从内心里佩服她，尊敬她，勉励自己学习她的榜样，也要做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我日夜盼望的那个星期日终于来到了。清晨，我坐上电车，来到法租界蒲石路。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晴天，我轻快地走向目的地。警予同志的家，我去过不止一次了，但这一次与往常不同，心情格外兴奋和激动。我到了那里，很高兴地看到她和蔡和森同志都在家里。和森同志因为患气管炎，正靠在床上看书。警予同志坐在一旁，一见我，就亲切地站起来打招呼。

我告诉她：“秋白同志约我来谈我的入党问题。”她爽朗地笑着说：“早该这样做了。”额上飞舞着一对秀丽的眉毛，从薄薄的嘴唇里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不一会儿，秋白也来了。他很关心地询问了和森同志的病况，在一旁坐了下来。警予同志要我谈谈上海丝厂罢工的情况，我便告诉他们说：有一次，我到几个参加罢工的女工家里去，她们把我带到“公会”办公室去了。那个地方很讲究，大门外挂着“上海丝厂同业公会”的醒目招牌，会客室里的长桌上，铺着白桌布，摆着很漂亮的茶壶茶碗。见到这种排场，我就疑惑起来，我们的工会怎么会

如此阔气呢？这时，一个胖胖的约莫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怪模怪样地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绸衣服，与面前的工人姐妹的褴褛模样恰恰成为鲜明的对照。女工见了她，都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称呼她“穆会长”。原来，这个“会长”叫穆子英，是上海滩上的女流氓，是资本家雇佣的工贼。这个“公会”，根本不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我向秋白、警予同志讲完这件事后，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工人应该有自己的组织。

秋白认真地听完我的叙述后说：“你们的工作应该从底下做起，钻到工人群众里面去，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在群众斗争中揭露工贼的面目，使工人群众不相信他们，而相信党，相信自己的力量。”

警予同志接着说：“目前我们在女工中还缺少工作基础，女工的觉悟还比较低，我们只好先用社会上惯用的结拜姐妹、交朋友的方式进行工作，然后逐步建立工会组织。”

靠在床上的和森同志也热情地参加了我们的谈话。他介绍了西欧社会民主党欺骗工人群众和利用工贼来破坏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指出在工作中要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不要上工贼的当。

接着，话题转到我的入党问题上来。我表示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警予同志笑了，发亮的眼睛亲切地望着我。秋白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诚挚地说：“我和警予同志都愿意听你谈谈入党的动机。”他回过头来，关怀地对和森同志说：“你身体不好，还是多休息。”和森同志就从床上下来，他那高高的个子显得很瘦弱。他沉重地呼吸着，走到房门外面，躺到躺椅上看报。

我叙述了个人的经历和生活上的遭遇，谈到党和团对我的培

养教育，以及我对党的认识和为党献身的决心。

秋白听完我的叙述，严肃地说：“你从封建家庭里跑出来是有勇气的，但是，革命是长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你一定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经得起种种考验。”接着，他分析了我的思想认识，阐明了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最后，他满怀热情地说：“是的，你要求加入共产党是完全正确的。我愿意介绍你入党。”

听到秋白这几句话，警予同志忽然活泼地跳起来，激动地拥抱着我，鼓励我努力锻炼，更勇敢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

几天以后，有秋白、警予、施存统等同志参加的上海大学党支部大会上，通过了接收我入党的决定。从此以后，我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作为这个伟大的集体中的一员，和同志们一起参加了各项革命工作。

上海大学的党支部，是在秋白和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任弼时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支部的同志都是当时开展群众运动的骨干，在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市学联、妇女团体和工人组织中担负着领导工作，他们在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埋头苦干，英勇奋斗，在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间，秋白从广州回到上海后，给我们做了几次报告，详细分析了革命斗争的形势，指出革命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揭露国民党右派加紧进行着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等等反革命活动，并阐明了当前党的方针和政策。

果然，国民党右派于一九二四年双十节在上海制造了杀害黄仁同志的血案。那时，江浙军阀正在混战，党为了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决定于双十节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名叫“国民大会”。国民党右

派却利用这个大会为军阀卢永祥作伥，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收买地痞流氓打击革命力量。

双十节的前几天，上海大学党支部召开会议，全国学生总会的负责同志汇报了筹备国民大会的情况和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活动。秋白听完汇报后，指示负责筹备国民大会的同志要密切注意国民党右派的活动，随时揭穿他们的阴谋，团结群众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给准备参加大会的同志们布置了具体任务。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中午，我和几个同学坐了电车，向国民大会会场——北河南路天后宫赶去。我们走进拥挤的会场。看见我们的人正在会场里散发传单，也看见不少地痞流氓在尖声怪调地叫嚷着惹是生非，但在我们的纠察队员和群众的制止下，这批家伙暂时还不敢过份放肆。

大会开始了。担任主席的国民党右派喻育之在台上摇头晃脑地说：“今日国民大会，本良心之主张，不为党派所利用……”胡说了一通。接着钻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家伙，张口鼓吹军阀卢永祥是“拥护正义的”、“应该帮助卢永祥作战……”。这些鬼话引起了群众的愤怒，会场上发出了反击他们的口号声、责问声。国民党右派就指使地痞流氓借端打人，我们的纠察队员上前阻止，也遭到他们的殴打。

这时，全国学生总会主任郭寿华同志跳上讲台，义正词严地要求大会主席维持会场秩序，制止暴徒行凶，并大声对群众说：“今天的国民大会，就是要打倒一切军阀和帝国主义，……”

会场上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喻育之恼羞成怒，从座位上跳起来，唾沫飞溅，反诬群众“扰乱会场”，横蛮无理地禁止郭寿华讲话。另一个国民党右派分子童理璋乘机指挥暴徒上台